



第3期（总3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曼德拉 1999 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3
北大五位教授新当选 201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9
“体验饥饿”公益体验活动在北大举办	11

■ 史苑钩沉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15
我和北大	19

■ 网教之声

大学已死？大学永存	35
在线教育：卡位正当时	50

■ 北大新语

北大新语·风骨	57
北大新语·论学	63

编辑寄语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很多 80 后都是在中学时代听过 BEYOND 这首《光辉岁月》——写给被囚禁在罗本岛的黑人领袖曼德拉的歌，才认识了南非这位为民主自由奋斗了一生的人。2013 年 12 月 5 日（当地时间），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享年 95 岁。曼德拉曾经两次访问北京大学，本期刊选了曼德拉 1999 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以纪念这位伟人。

今年北大 5 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人数连续两次居全国高校之首。截至目前，北大已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67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9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 人。

本期新开设《北大新语》栏目，摘编严敏杰、杨虎整理过的北大掌故，用语录体汇集了北大百余年来历史人物的精彩“话语”，堪称北大的《世说新语》，选《风骨》和《论学》两篇，献给老师和同学们。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郑鹞、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曾玉芬

本期责编：唐海峰、王迎春

■ 新闻动态

曼德拉 1999 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 5 日 20 点 50 分逝世，享年 95 岁。曼德拉离开了我们，加入了非洲祖先的行列。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所追求的事业永存。

曼德拉是当代历史唯一的这样一位伟人，他既受到东方世界的崇敬，也受到西方世界的景仰。一位政治家从毫无自由的阶下囚成为世界上令人深深崇敬的伟人，在全球各地受到欢呼和拥戴——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方还是北方，穷人还是富人，黑人还是白人，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这就是曼德拉，一个世界的奇迹。

曼德拉曾经两次访问北京大学，1992 年 10 月他首次访华，5 日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99 年 5 月，曼德拉总统应邀访华，成为首位访华的南非国家元首。访华期间，他又一次访问北京大学并作讲演。纪念一位伟人的最好方式是用他的精神来激励我们，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下面与大家分享 1999 年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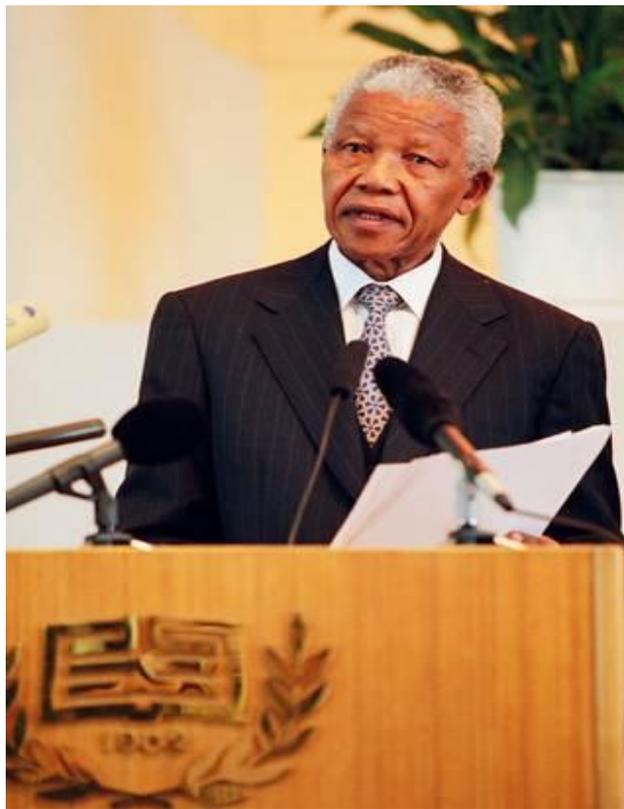
南非总统曼德拉北大演讲

北京大学的校长先生，老师们，同学们，尊敬的来宾们，1992 年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贵校授予我的一个荣誉学位，今天，作为贵校的一名荣誉校友收到邀请又来到这里对贵校的师生发表演说，我感到格外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荣幸。

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因为这可能是我退休离开公职前最后一次对一所授予我学位的高等学府发表演说，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本届政府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任期内、我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演讲。

我也许还要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刚刚所说的事实也提醒我，在进入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一定会失业的，而且我也不知道那时还有多少大学愿意听一个老头发表演讲，尽管他是一位前总统，但这个老头除了他年纪大点已经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了。

我想说的是，是独一无二的。不刚刚所说的那些多年间我曾在很多机构、组织和表演说，实际上样的场合都是独一无二这样的场合。人民和人民之间在就涉及南非人民之间的关系；



说这个场合仅仅因为我事实。过去很多国家对很各个方面发任何一个这一无二的。每都涉及一种的关系，而现民和中国人而且每一个

这样的场合都表明了理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像北京大学特有的学习传统和南非人民不断追求自由和正义传统间的密切联系。

每一次这样的场合我们都发现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获得知识并拓展人类自由的疆界。每一个这样的场合都是对人们给予我们的声援和支持的纪念和庆祝，正如多年来中国人民和政府在南非争取独立和自由过程中给予的毫不动摇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方面的支持；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也是对南非人民在奋斗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的一种敬意；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也是我们在重建伙伴关系方面所作的承诺。

尽管国家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也是由一些共同的因素所构成。这些因素也决定了人类在这个世纪将要结束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在实现民主之后，南非人民最基本的需求问题得以解决，特别是那些最贫困的人民的问题。从这个过程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得到启发，想要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的体制，就要确保这个体制能给那些由于受到压迫长期处于贫困的人民带来生活方面实实在在的改善。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像现在一样处于无家可归、饥饿和文盲的状态，我们的自由将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的文明将会成为一句空话。虽然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拥有强劲的经济和可持续的增长，这也反过来确定了我们要和许多国家，应该说是全世界要一起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来源于我们经济体制间的相互依存，来源于现在全球化的

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我们必须保证，全球化不仅仅是能使强国获益，也要给贫困中的男女老幼带来利益。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地区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我们要确保管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多边机构得到改革和调整，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我们必须消除非洲越来越边缘化的根源。南非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国，中国也在和 77 国集团交往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我想我们两国都能在这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现在全球还面临第二类重要挑战，就是和平和安全方面的挑战。在此我们也需要采取一种多边的方式。在一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的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联合国作为一个要求人们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冲突的世界组织得以建立。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科索沃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十分担心。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人权，在种族清洗过程中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由于它的一些常任理事国采取单方面的和破坏性的活动而被漠视。这两方面的行动都必须遭到最强烈的谴责。

我们感到担心，不仅仅因为它即期的影响，也因为它像发展方面的挑战一样，使得我们对于国际机构产生了怀疑。在这个目睹了如此多的痛苦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怀疑世界还能否承受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这个应该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机构的权威遭到破坏。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和南非是国际社会的两个成员，同时他们也是分属亚洲和非洲的两个国家。当这两个大陆和大陆上的人民的命运被更强大的殖民力量所掌握的时候，我们的古老文明和商贸之间的联系都遭到了破坏。今天，你们，亚洲正在崛起，非洲也在复兴。与此同时，非洲和亚洲之间必须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为此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来促进公平、维护和平，要能在国际组织的决策中反映出这样的准则，特别是非洲边缘化的这种威胁必须得到消除。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一个国际事务上的领导国家，可能作出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南非虽然能力有限，也愿意尽其绵薄之力与中国进行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在发展我们的友谊的同时我们也要将这种友谊反映在我们强有力的双边关系当中。我可以自豪地讲，在我们民主国家建立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扩大，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女士们先生们，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我们进入新千年时的一些挑战。这些困难也使我们想到，五十年前人们的许多希望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实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鼓吹一种绝望的情绪，而是要敦促大家维护在实现共同理想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还要保护和改善我们在解决问题方面应采取的集体和多边的方式。任何一代人所能实现的最好的目标就是在应对挑战方面取得进展，并为后来人做好铺垫。

在过去很多次今天这样类似的场合，我的经历都使我相信：在斗争过程中，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世界各国人民都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给



予帮助。知识和科学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舞台，全球人民都能进行合作，为实现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目标作出贡献。因此，我呼吁知识界的各位能够帮助制定一些有助于实现这些理想的政策。让我们一起实现亚洲和非洲建立起新型伙伴关系、中国和南非间建立起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理想！再次感谢各位给予我的荣幸！

谢谢！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北大五位教授新当选 201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3年新当选院士名单。2013年中国科学院通过选举共产生了53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9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北大5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人数连续两次居全国高校之首。

北京大学2013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

单 位	姓 名	出生年月	学 部	专 业
工学院	陈十一	1956年10月	数学物理学部	力学
物理学院	欧阳颀	1955年7月	数学物理学部	非线性物理
分子医学 所	程和平	1962年12月	生命科学和医 学学部	细胞生物学和 生物物理学
物理学院	龚旗煌	1964年8月	信息技术科学 部	非线性光学、 超快光子学
工学院	方岱宁	1958年4月	技术科学部	固体力学



从左到右依次为：欧阳颀院士、龚旗煌院士、陈十一院士、方岱宁院士、程和平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也是北大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志。截至目前，北大已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67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9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 人。

编辑：歆琴

“体验饥饿”公益体验活动在北大举办

2013年12月9日，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青联，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中心联合举办的“体验饥饿——牵手残疾儿童和残疾家庭子女”公益体验活动在北京大学举办，标志着“2013/2014年度第一届体验饥饿——牵手残疾儿童和残疾家庭子女”活动的正式展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中国残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兼人事部主任相自成等领导 and 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是北京大学“心教育”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心教育”是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中心结合北大学生特点，发展出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模式。与以往传统模式中通过心理咨询、团体活动、课堂授课的教育方式不同的是，“心教育”是通过高雅艺术感染观众，高尚故事感动心灵，高端访谈启发智慧，向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呈现阳光心态，倡导互帮互助、心灵联结的校园文化，以及传递利他大爱的人生智慧。

我国现有残疾人8500多万，0-14岁残疾儿童约有400万人，其中80%生活在农村地区。为了关注残疾儿童的需求，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集善残疾儿童助养——体验饥饿”活动，通过8或12小时的禁食，体验残疾儿童及残疾家庭子女的困苦，并筹集善款。此次体验饥饿活动已有北京大学、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奥托博克（中国）工业

有限公司、生命阳光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在内的 9 家企业、机构及高校报名参加，人数超过 1000 人，支持人数 7580 人次，累计捐款 50 多万元。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器乐联奏《风情组曲》

此次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活动以体验饥饿、体验残疾人生活、访谈互动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出等形式开展。在日间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们化身为“饥饿先锋”，带领他们的同龄人，宣誓在 12 小时内禁食，全心参与体验饥饿活动，向残疾儿童及残疾家庭子女伸出援手，并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包括默契无手绘、盲行等体验身体障碍的团体活动。

九家企业、机构及高校通过体验饥饿活动筹集的 50 多万元善款将捐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资助湖北荆州、陕西宝鸡和甘肃定西的残疾儿童配备辅助器具、康复器具及家庭无障碍环境的改造，帮助他们跨越生活中的障碍。这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

众募款的一次全新尝试。为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将通过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的网站（www.helpcada.org）向社会公众公布筹款信息、工作进展报告、项目监管报告及儿童整体受助状况，向捐款人报告受助儿童成长状况。

在闭幕礼的晚会上，著名主持人张洁和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徐凯文副教授共同担任访谈主持人，访谈了残疾人艺术团邵丽华、黄阳光、王琦、刘延辉等著名残疾人演员，以及心理专家、中国残联团委闫洪丰书记。整场晚会以三个环节展开，从“体验饥饿：感同身受”，到“体验科技：助人”，再到“体验拥有：感恩”，层层递进，



现场互动环节：无手绘画比赛

包括残疾人艺术团文艺汇演、生命阳光中心残疾人艺术爱好者汇演、艺术团成员高端访谈、全场互动等

内容，多样的形式令整场演出不但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启发心智、催人奋进。

在互动环节中，参与活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畅谈体验饥饿的感受，并在不能使用双手的情况下与失去双臂的残疾人演员黄阳光进行绘制竞赛，从中体验从失去到拥有，学会感恩。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在“体验失去”的访谈中谈到每个人内心中都有爱人之心，利他之心，助人之心，要感恩拥有、感恩当下。活动现场观众与残疾演员通过微博、短信互动，跨越信息鸿沟。活动的最后，邰丽华团长还带领全体参会人员学习“爱，无障碍”的手语，将活动推向高潮。

晚会现场，参会人员还积极通过微博墙进行互动。一位网友提到：“你是我的眼，第一次听现场版的！好激动！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带给我的是另一种心灵最深处的感动！”网友“武小七 Claire”提到：“看到残疾人朋友的坚强，想想健康的我们，再大的压力也都是浮云，希望能够为他们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加油，看好你们噢！”网友“Anchor__Emily”提到：“饥饿，感同身受。残疾，不是距离。坚强是一种无法替代的魅力[心]爱，无障碍。”

此次活动作为“2013/2014 年度第一届体验饥饿——牵手残疾儿童和残疾家庭子女”活动的开端，倡议广大公众身体力行，感同身受，加入扶残助残的队伍，让广大残疾人兄弟姐妹共享社会文明进步和改革发展成果。大学生作为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给公益事业带来了活力和创新。而公益本身也给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大学生在从事公益的过程中，帮助了他人，也帮助了自己。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焱悠

■ 史苑钩沉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我一九三零年来北平（北京），无家无业在这古都漂泊。只有过一次短期就业，那便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和一位同事对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以及馆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为我的老师。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那时学生少，借书的人不多；许多书只准馆内阅览，多半借到阅览室去看，办借出手续的人很少。高潮一过，我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了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书库内的同事请教。当时是新建的楼，在沙滩红楼后面。书库有四层，下层是西文书，近便，去得多些。中间两层是中文书，也常去。最上一层是善本，等闲不敢去，去时总要向那里的老先生讲几句话，才敢翻书并请他指点一二。当时理科书另在一处，不少系自有图书室，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我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的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我也熟悉了他们，知道了“畅销”和“滞销”的书，一时的风气，查找论文资料的途径，

以至于有些人的癖好。有的人和我互相认识了。更多的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些读书导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的书我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他还介绍给我几本外文的入门书。可是我只当作常识，没有学习，辜负了他的好意。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教授们很少亲自来借书。有一次进来一位神气有点落拓的穿旧长袍的老先生。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署名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我连忙请他稍候，不把书单交给平时取书的人，自己快步跑上四楼书库。库内老先生一看就皱眉，说，他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全是善本、珍本，有的还是指定抽借一册，而且借去一定不还。这怎么办？后来才想出一个主意。我去对他恭恭敬敬地说，这些书我们无权出借。现在某馆长已换了某主任，请他到办公室去找主任批下来才好出借。他一听馆长换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无表情，仍旧一言不发，拿起书单，转身扬长而去。我望到他的背影出门，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

去找善本书库中人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又一次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女生借书，手拿一迭稿子向借书台上一放。她借的是一些旧杂志。我让取书人入库寻找，同时向那部稿瞥了一眼。封面上题目是关于新诗的历史的，作者是当时在报刊上发表新诗的女诗人，导师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我大约免不了一呆。她看出我的注意行向，也许是有点得意，便把稿子递给我看。我受宠若惊，连忙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其中差不多全是我知道的。望望引的名字和材料，再看几行作者的评论，就知道了大意。大约她见我又像看又像没看，就在我匆匆翻完后不吝赐教。她说，这是导师出的题目，还没有人作过，现在是来照导师意见找材料核对并补充。她还怕我不明白，又耐心说明全文结构，并将得意的精彩之处指给我看。旧杂志不好找，所以等的时间长。她是以我为工具打发时间吧？不过她瞧得起我，仍使我感动。我由此又学到了一点。原来大学毕业论文是有一定规格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近事也能作为学术论文的内容。

我当时这样的行为纯粹出于少年好奇，连求知欲都算不上，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文人。我自知才能和境遇都决不允许我立什么远大

目标。我只是想对那些莫测高深的当时和未来的学者们暗暗测一测。我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至于我居然也会进入这一行列，滥竽充数，那是出于后来的机缘，并不是当时在北大想到的。可是种因确实是在北大。

来源：三联书店《北大旧事》

（作者：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1912年8月14日生于江西。文学家，翻译家，学者。中学一年级就失学，学历不过小学毕业。1930年到北平求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自学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国语言，开始翻译和写作。1938年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任湖南桃源女子中学英文教师，同时兼任湖南大学法文讲师。1941年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随后娶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妹妹唐季雍为妻。和季羨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历任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我和北大

我是在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教书的，到一九二九年离开，前后凡十六年。其间所经历者，所见闻者，诸如新旧之争，内部倾轧，蔡元培之长校与离职，蒋梦麟之长校，五四运动之于北大，等等，有足述者。惟北京大学自清末京师大学堂以来，迄今垂六十余年，人事沧桑，变化甚大，我在北大十六年间，仅为其中一片段，盖无可为系统之概述，因就记忆所及而掇拾之，谨作参考。

我进北大之缘起

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陕西藩台樊增祥选派五十名陕西籍学生到日本留学（张季鸾即在其内），我和三弟沈兼士因非陕籍，不能入选，乃自费和他们同往日本求学，由一位四川名流徐自休先生率领赴日。当时，有一位在江西出生的浙江吴兴人蔡宝善在陕西做候补县官，因同乡关系，蔡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许炳堃（也是浙江湖州府同乡），托其照顾我和兼士。抵日本时，炳堃特来迎迓，从此订交。

我们兄弟在日本九个月，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供应继续求学，兼士考取了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我则于一九〇六年返国。回陕西住了一年，即迁返浙江吴兴闲居。不久，到杭州做事，曾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过课，在幼级师范教过半年书，又在第一中学教过课。第一中学校长马幼渔和我弟弟兼士在日本同学，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弟子。其时，兼士也已从日本返国，在嘉兴教书。

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燠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燠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燠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燠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燠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燠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暉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到北京后，一天早晨，我到北大去看何燠时。略谈后，燠时就请教务长姚叔节（桐城姚鼐之后，在北大教桐城派古文）来见面。姚叔节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要我在预科教中国历史。姚三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第二天，见到胡仁源，胡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睬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璪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新旧之争

当时，北大分几科，每科设学长。理科学长夏元璪，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何燠时，预科学长胡仁源，文科没有学长，由一个姓夏的（忘其名）负责，名义好像是文科教务长。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燠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

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东清铁路和京师大学堂的关

系，我就不知其详了），蔡元培、董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严复交出这个存折，被严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长校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何燠时代理校长后，教育部也命其交出存折，而各科学长不同意，鼓动学生反对。以后，这个空头存折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燠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

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

京师大学堂的怪人怪事不少。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的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了。

预科还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

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有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我记得一九二八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听说是练习了几天几夜，上台去还是结结巴巴。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那就可以想见了。

蔡元培长北大之来由

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为时甚暂，即辞职，后去德国深造。大约在一九一六年，蔡到北京，其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北大代理校长何燠时大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后辞职回诸暨老家去了，辞职的原因不详，但不外也是内部人事之争，赶何，我疑胡仁源亦在内。何辞职后，即由预科学长胡仁源代理校长，预科学长由胡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是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之长北大，盖出于沈步洲之策划。

天下事说来也怪。沈步洲为什么要作此策划呢？原来，沈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据说，胡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所以欲谋去胡而后快，他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先生为海内外知名之士，沈抬出蔡来长北大，当然振振有词。北洋政府呢，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之为物，外国都有的，中国也不能没有，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首肯了。

那时我曾在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兼课，医专的校长是汤尔和。有一天，我到医科学校上课，汤尔和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长。你看北大还能办吗？内部乱糟糟，简直无从办起。”我回答说：“你认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呀！你的话和夏浮筠一样，他也认为蔡先生可以来办北大，既然你们都认为如此，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夏浮筠和蔡元培在德国同学，夏回国较早，严复长北大时即来北大教书，浮筠和尔和是同乡，极得尔和的信任。

果然，汤尔和去见蔡元培，极言北大之可办。蔡先生之同意出长北大是否即由汤之一言，我不得而知，但总之，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就到北大来当校长了。

我和蔡元培先生

汤尔和对我谈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的时候，我和蔡先生尚无一面之雅。尔和对我谈话以后大约第三天，我在译学馆上课（北大预科当时不在马神庙，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忽然门房来通知我：“有一位蔡先生来看您。”我大吃一惊，一则是素昧平生，颇觉意外，二则是心中不免思索：社会上已轰传蔡先生将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阅历、世故应是很深的，可这次不大世故，既然要看我，大可到我家里去，何必到北大预科这个公开场所来呢。

蔡先生和我见面后，谈及尔和介绍，特来拜访。略谈片刻辞去，目的在于相识一下。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

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先生和我的关系，自那时开始，事隔数十年，蔡已归道山，我至今思之，犹感慨系之。

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我于蔡先生的学问无所窥，然观其到北大之初所持办学主张，有两点可资一谈：

（一）北大分工、理、文、法、预五科，蔡先生来后，力主将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停办法科，使北大专办文理二科，预科照旧。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似乎是以美学教育为中心，他来以后添设教育系（本来只有文学、哲学二系）；他一向反对学政治法律，因此主张不办法科（未获通过）；他不重视工科，似乎是受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影响。

（二）蔡先生到北大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辜鸿铭、王国维、胡适之、陈独秀等新的旧的，左的右的，同时并存。蔡先生云：“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

育思想今日当然已成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国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综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成绩，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然而，在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企图以新学救国，终于成了一场幻梦。五四运动以后，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或独善其身，或趋炎附势，或依违两可、随世沉浮，其中种种，就不在本文记述之内了。

我和陈独秀

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和同校教员刘三友善。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著时望的文人，以刘三名，能诗善饮，同我和沈士远相识。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

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涑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谈，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约也向蔡先生进过言。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评议会做的几件事

评议会会员由全体教授互举，约每五人中举一人。当时教授共八十余人（讲师、助教一百五十余人不在内），举评议员十七人，校长为评议长。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女禁），均须评议会通过。文、理、法、预四科教授都有代表参加评议会，大家都很兴奋。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有一天早上，我到学校，黄幼轩（蔡的郎舅，在北大当会计）跑来告诉我，蔡先生走了。我大惊，和幼渔、玄同、作人等计议。幼渔问：怎么办？我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论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在这期间，夷初（马叙伦）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猝，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拥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

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系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评论会成立以后，我忘了是哪一年，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当教务长，主要是反对胡适。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张牙舞爪，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当时反对胡适最力的是理科天文学教授秦景阳（秦汾）。我们和蔡先生商量，决定提名马寅初为候选人。当时，理科提出俞同奎，文科提出陈大齐，法科提出马寅初，这三个候选人势均力敌，在评论会选举时，主席蔡先生投马寅初一票，马得以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为什么蔡先生同意以马寅初当教务长呢？一则是理科反对文科的人出来当教务长，我们为了免去无谓之争端，就提出以法科的人来担任；二则是马寅初本来是北大教员会的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他得罪了北京中学界，中学教员很不满意他，而教员会和北京学界的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商量，教员会改推康宝忠和马叙伦领导，马寅初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了第一任教务长。

评论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我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满意。”我答曰：“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法子呢。”

蔡元培的走和蒋梦麟的来

蔡先生到北大后，尽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十一时挟着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帐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教育部对蔡先生掣肘的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袁希涛对蔡不好，在我想来，是江苏教育会已隐然操纵当时学界，想包围蔡先生为江苏教育会所用，而蔡先生被我们包围了，因此他们就捣蛋。此在旧社会，亦系常有的事，在民初北京官场中更不足为奇。

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

不料过了几天，蔡先生对我说：“不好了，黄任之大发脾气，说我抢他的人，那就算了吧。”其事遂寝。蒋梦麟由美归国后，我们也就不提此事了。

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先生离京，不知何往，北大评议会议决，派我和马裕藻（幼渔）、徐森玉（时任职北大图书馆）、狄膺（学生代表）到杭州去找汤尔和，目的是迎蔡先生回来。汤尔和因北京各学校在五四

运动中罢课，即回杭州。我们不知蔡先生的行踪，但肯定汤尔和是一定知道的，因此，直诣杭州。

到杭州后，先由我一个人去找汤尔和。我一到门口，尔和就迎出来，说：“我昨天就知道你来了，蒋竹庄从北京来电报说：‘某某阴谋家到杭州来了，你要注意！’”我听了也不答腔，先问他蔡先生在何处，他说：“我明天陪你去看蔡先生。”

翌日，尔和偕我到西湖上某庄子（大约是刘庄），见到蔡先生，正在谈话时，尔和走开了（打电话之类的事），蔡先生对我说：“很奇怪，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尔和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要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说奇怪不奇怪？”蔡接着讲：“我对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梦麟来，任之大吵，你现在要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任之才行。尔和说：任之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先生又说：“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和他讲了。”

总之，蔡先生就答应了。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任其摆弄，我始终不解其故。和蔡见面后，尔和要我们回北京说：“蔡先生可以回来，但暂时不能来，由蒋梦麟代理。”北大诸人亦不知其故，就此了事。

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北大章程上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我就在评议会提出要去法国，胡适反对，他说国文教员不必到法国去。我说：我去过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评议会通过了，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起人是一

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到一九二一年，才答应除月薪照发外，另给我四十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发病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

（来源：三联书店《北大旧事》作者：沈尹默，《新青年》杂志6位编辑之一，中国新诗体裁的倡导者。沈尹默先生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陕西汉阴。早年曾留学日本。解放前曾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中法文化交流出版委员会主任、监察委员等职。1946年后因不满国民党当局，退隐上海，以鬻字为生。解放后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管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职。）

■ 网教之声

大学已死？大学永存

2012年9月17日，巴基斯坦政府切断了YouTube的访问权，并称这是为了封锁一部在全球范围内煽动抗议活动的反穆斯林电影预告片。

这一决定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后果，是让巴基斯坦国内215个参加一门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的人突然间没有了座位。这门免费的大学课程由硅谷的创业公司Udacity开办，课程的网站上包括了数百段YouTube视频短片。全世界大约有2.3万人注册了这门课，里面就有今年11岁、家住巴基斯坦拉合尔市(Lahore)的赫蒂彻·尼亚齐(Khadijah Niazi)。她正做到期末考试的第6题，突然看到一行短信息“该站点无法访问”。

尼亚齐深受打击。她一直非常努力地学习，想在她12岁生日之前掌握这门物理课，现在离生日还有一星期。怎么办？尼亚齐在这门课的讨论板上发了一个帖子抱怨说：“我很愤怒，但我不会放弃。”

在每个国家，教育改变的进程都非常缓慢，几乎难以察觉其发展。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真的不一样。不到一小时，在马来西亚参加这场考试的年轻男孩马齐亚尔·科萨里法尔(Maziar Kosarifar)，开始把考试题目的详细描述在网上发布出来给尼亚齐。一位在葡萄牙上这门课的新手物理教授罗萨·布里吉达(Rosa Brigida)，试图创造出一种解决方法，这样尼亚齐就能绕过Youtube，但没有成功。12岁的英国男孩威廉(William)也许诺会帮忙，并告诫尼亚齐不要在网上写任何关于她政府的负面信息。

所有这些学生没有一个曾经见过彼此的面。这门物理课的学生名册上包括了来自 125 个国家的人。但一起上了几周课，在牛顿物理定律、摩擦和简谐运动这些问题上互相帮助，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在图书馆里同一张卡座上学习。在一起，他们找到了一条通往一门严谨的免费大学课程的通路；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人把它给封锁住。

当天夜里，葡萄牙教授成功下载了所有的视频，然后把它们上传到了一个不受审查的照片分享网站上。这花了她 4 个小时，但奏效了。第二天，尼亚齐通过了期终考试，并获得了最高荣誉。“耶~~~~~”她在新发布的一个帖子里这样写道（实际上她一共用了 43 个“耶”字，但你们明白意思就行了）。她是所有完成 Udacity 物理 100 课程中年纪最小的女生，而这门课程对普通大学生来说都是门具有挑战性的课。

同一天，尼亚齐和她的双胞胎兄弟穆罕默德（Muhammad）一起，报名参加了“计算机科学 101”这门课。在英国，威廉开始为他们下载视频。

用低廉的价格进行高端的教育

在线学习这个概念已经被炒作了十几年。上世纪 90 年代末，思科公司（Cisco）的 CEO 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曾预言：“互联网上的教育将会大到让电子邮件的使用显得像个舍入误差。”只有一个问题：网络课程总的来说，并不是很好。时至今日，大部分都是干巴巴、平平庸庸的东西，由在线阅读、书面问答和低成本制作的讲课视频拼凑而成。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学生花数百美元报名参加这些课程——30%

的学生反映都至少上过一门网络课程，这一比例在 2003 年是 10%——但上完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提高，如果他们去上社区大学，结果也会差不多。

人们曾希望有一天互联网（或更具体的说，是使用互联网的人）能颠覆高等教育；现在，几股力量联合起来重振这一希望——不是通过简单的置换传播方法，而是经由重新发明教育的最终产品。从云计算到社交媒体，种种新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创建一个像样的教育平台所需的成本，同时大幅提高了完成这样一个教育平台的几率。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类似 Udacity、Coursera 和 edX 这样的创业公司（每个都获得了一所名牌大学的认可）已经将 219 门大学课程放到了网上，全部免费公开。许多传统高等院校也在网上提供课程乃至完整的学位培养计划。对新技能的需求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各个大洲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现代经济中成功，他们需要能在一个比以往更高的水平上思考、推理、编码和计算。

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上领先世界的美国却正在领着自己最年轻的一代走向深渊。根据纽约美联储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显示，美国人在助学贷款上一共欠债 9140 亿美元；其他预计称总额达到了 1 万亿美元。这比整个美国的信用卡债务都还要多。平均来说，大学学位还是能让人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某一点付清自己（包括利息）。但 40% 左右的四年制大学本科生无法在六年内获得学位。无论毕业与否，助学贷款是一定要还的；而助学贷款不像其他类型的贷款，一

般宣布破产也不能撇清。政府在把钱收回之前可以扣住退税不还，使工资在账面上看起来更漂亮——却不断地收窄年轻人的选择范围和购买能力。

这么多的债，让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未来。根据 2011 年出版的《学术漂泊》（Academically Adrift）书中的一份报告，大学 3 个学期的教育对批判性思考、复杂推理和写作技巧只有“勉强注意得到”的影响。在《时代周刊》和纽约卡耐基集团（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发起的一次新调查中，在 1000 名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 80% 的人认为在很多所大学里，学生们得到的教育抵不上他们为此支付的金钱。在接受调查的 540 位大学的校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当中，有 41% 赞同前者的看法。

而抵达这一由高需求、不均衡供应和离谱价格所形成的危险十字路口的，是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不幸被赋予了 MOOC 这样一个缩写。）。今年，多亏来自哈佛、斯坦福和 MIT 等大牌高校的投资，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变得受人尊敬起来。风险投资资本也早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MOOC 的商业模式也让人难以抗拒——尼亚齐上的物理课，其成本每个学生只有差不多 2 美元。

这不，舆论已经超越了现实；绝望的父母们祈祷着免费的网络大学会最终把学费的泡沫戳爆，心急如焚的大学官员们则不想错过这一波潜在的淘金潮。改变的迹象随处可见，恐慌的亦然。今年春天，哈佛大学和 MIT 在一个叫“edX”的非营利 MOOC 上投资 600 万美元。一个月后，

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毫无征兆的突然下课——但一位焦虑的董事会成员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其他大学的 MOOC 以后，又很快官复原职。

无论如何，看起来有更多的人最终将花更少的钱学到更多的东西。总算如此了。接下来的问题也许是：哪些人？

顺着大脑学习的规律教学

今天秋天，为了探高等教育的未来，我到一些实体大学里听了课，还注册了半打的 MOOC。网上的课大部分我都中途退出了，因为它们不是很好。或者说，这些课若是让我安安稳稳的坐在普林斯顿大学 19 世纪修的大厅里听还好；但在网上，它们没法儿比得上我电脑上的其他干扰。

我唯一感兴趣的课——Udacity 的物理——难住了我。我并不喜欢物理，这也是我在过去的 38 年中一直避开它不学的原因。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门课的教授方法：它是按照大脑实际学习的方式来设计的。换句话说，它几乎与我曾经上过的课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第 1 分钟：物理 100 从一段旋转的意大利视频蒙太奇开始，慢动作播放的喷泉和海滩上踢足球的男孩们。这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像是里奇·史蒂夫斯（Rick Steves，王牌旅游节目主持人）教的物理，但比起我选的其他网络课好了一大截——那些课的开头都是没打好灯的教授冲镜头盯得人直发憊。

当 Udacity 物理课的教授出现时，他看着好像只有 12 岁；实际上他已经满 25 了。“我叫安迪·布朗（Andy Brown），是这门课的导师，然后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意大利的锡拉丘兹（Siracusa）！”他

留着平头，MIT 本科毕业；他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终身教授职位，而这将会成为他的长处之一。

“这门课是真正为了任何人而设计的……在第一单元，我们将用一个迷住了希腊人的问题开始：我们的地球有多大？”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布朗还去了阿基米德的出生地，这位数学家在两千多年前也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

第 4 分钟：布朗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希腊人知道些什么？”视频停了，耐心地等着我从答案中选择一个，这确实是个需要花时间想想的任务。每 3 分钟左右就这样来一次，让我很难去看邮件或者分心做别的事情——连一分钟都不会。

“你答对了！”正确答出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满足感是惊人的。（我遇见的一个大学 MOOC 学生把这叫“金星级来一发”。）这些问题也并不容易。我答错了很多题，但我可以再来一次，直到取得金星。

人类喜欢即时的反馈，这是我们喜欢游戏的原因之一。研究者们知道许多关于大脑运作的事情，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知识罕有被用于影响我们的教育系统。对物理课程的研究表明，在学完一门传统课之后，学生们能够背诵出牛顿定律，甚至还能做出些微积分运算题。但他们不能将这些定律应用到此前没有遇见过的问题之中。他们记住了信息，但并没有学会它——这让老师们很是吃惊。

《科学》2011 年发表了一份研究，一个研究小组对英属巴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个本科物理大班做了一项实

验：在一周的时间里，班级中一部分人从一位经验丰富、评价甚高的教授那里正常听课；另一部分则由没有经验的研究生来教，使用研究者们设计的符合人类认知的授课策略。这些策略跟 Udacity 课上用的很像。学生分小组解决问题，导师时不时给些引导。学生们会收到频繁的反馈。在实验中，新手导师带的队伍出席率增加了 20%，在一周结束后的测试中分数也是另一队的两倍高。

第 8 分钟：布朗教授解释说，柏拉图也曾想要估计地球的周长（但失败了）。他说这些的时候，快速地把笔记写在一块白板上。这一片段只持续了几分钟，跟这门课里的其他所有视频一样。这也反映了大脑是如何学习的。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只能集中 10 到 18 分钟，之后思维就开始飘散了；这时就该让他们的大脑用刚刚接受到的新信息做点儿事情，比如联想或做题。

据该公司的统计，Udacity 的课上到这里，三段视频剪辑看完，差不多 1.5 万名学生的注意力都还没有散去。不过，这在 MOOC 来说也是高的。（由于注册不费什么精力也不花钱，许多人都看着新鲜点进来过会儿就离去。十个注册的人里通常只有一个坚持看到课程的最后一段视频。）和其他大多数网络课程一样，Udacity 的在线课程时间不是同步的，所以我能倒回去看，或者中途离开、想的时候再回来。这也符合大脑工作的方式：人类喜欢自主性。如果晚上学的效果最好，他们就喜欢在晚上学，按自己的步调来。

第 57 分钟：在看完 47 段穿插有小测试的快节奏视频之后，我确实明白了地球有多大。布朗用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回顾了几何和三角函数。到了收尾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测量一个直角三角形的阴影，建立一个数学比例式去计算地球的周长，就像个古时候的数学家。

布朗说：“恭喜！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现在能做的。”然后他让全班同学发送一份他们自己测量阴影的视频。我很怀疑。真有人愿意做这个吗？

是的，他们愿意。第一段视频来自芬兰坦佩雷（Tampere）的一位年轻女士——她是一名想要转行的鼓手。看她，披着一头金色的发髻，就在停车场测量阴影。另一位女士提交了自己完成实验的照片，还附了一首诗。一首诗！“我们求得了 C，终于 / 踏出一条路，走向我们自己的过去。”

这让同为芬兰人的布朗乐坏了。“超有艺术感的！”他在 Udacity 的办公室里四处炫耀这首诗。有一个学生在厄瓜多尔的 0 纬线做了这个实验。更多的人发帖提问；不出几分钟就得到了来自其他学生的详尽助答。这就仿佛整个问答社区一夜间拥有了实体，而且不可思议的活了过来。

教不好的老师，我们不要

当他还是斯坦福的终身教授时，Udacity 的创始人兼 CEO 塞巴斯蒂安·特隆（Sebastian Thrun）并没有顺着大脑的学习规律来教书。对此他并不感到自豪。他说：“我遵循了前人的经验。”他的学生们习惯了

传统的授课方式，在他的课程评估上给了高分。他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2011年，特隆和同事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教授决定，把他们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课放到网上。但在抽样调查其他的网络课程时，他们意识到大多都表现平平。为了吸引远方的学生，他们将会用到些不同的东西。因此，他们开始规划课程，把学生放在一切的中心。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们解答，这样他们就必须通过做来学，而不是听。

去年秋天，16万人报了名。但课程并没有特别让人激动——一开始的话。有个学生抱怨说，软件只许他们在每个问题上回答一次。特隆说：“我意识到，‘哇哦，我光想着给学生们打分而让他们去失败’。”因此，他改变软件的设定，放手让学生们作答，直到答正确为止。他还关注数据，他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当上万名学生都在同一道题上出错，他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身没有问好，然后就改正它。学生们也改变了课程的其他部分，建立了在线操场练习他们的所学，还把这门课翻译成了44门语言。

同时，特隆也告诉他斯坦福的学生们，如果不想去听课可以在网上学。超过3/4的学生选择了后者，在寝室里看视频、做练习，就好像他们身在千里之外。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期中考的时候，斯坦福学生们的平均成绩比历届整整高出了一个等级。他们在网上看来学得更多。同样的增长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也出现了。

不过，斯坦福的学生们并不是这门课程中表现最好的。在学期结束时，课程前 400 名中没有一个是来自斯坦福。

这件事迫使特隆重新思考他所了解的教学。在 worldview 改变之后，他创立了 Udacity。不像另一个营利性 MOOC 供应商 Coursera——Coursera 与很多学校都有合作，包括斯坦福、普林斯顿，还有最近的弗吉尼亚大学——Udacity 选择、培养并且摄制教授讲这门课的视频。自今年 1 月启动以来，Udacity 已经拒绝了大约 500 名教授志愿教书的申请，而且还因为质量不达标取消了一门课程（已经有 2 万名学生报名的数学课）。

现在，大多数大学 MOOC 的供应商都没有盈利。这一现状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特隆说将来有一天 Udacity 大概会对课程收费，但他声明价格会保持很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预计将会出现一个竞争者，偷走他所有的学生。

Udacity 不提供学位，它并不是一所政府承认的大学。学生们会获得一个纪念性质的 PDF 证书。分数以期末考试为基础。选择参加 Udacity 计算机科学课的期末考试的一家独立测试中心的学生，（交 89 美元）能够获得科罗拉多州大学—环球学院（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 Global Campus）的转换学分，科罗拉多州大学—环球学院是一所只在网上开办的学校。

让更多的院校承认转换学分会很好，但长远来看，Udacity 的目标是去掉中间人，直接奔着雇主去。今年 9 月，Udacity 宣布包括 Google

和微软在内的 6 家公司，对多种紧缺的技术课程进行了赞助，从 3D 图形编程到制作安卓系统手机上的应用程序都有。

与此同时，大约 3000 名学生已经报名参加了 Udacity 的雇主联系计划，让他们的简历与 350 家公司共享。一经录用，雇主企业会付给 Udacity 一笔费用。特隆说，到目前为止，大约有 20 名学生部分通过 Udacity 的帮助找到了工作。现年 24 岁的塔米尔·杜伯斯坦 (Tamir Duberstein)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学机械工程，在学完了 6 门 Udacity 的课程之后，不久前收到了两份工作邀请。他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如今在旧金山的一家软件公司上班。

尽管如此，除去高科技创业型公司，企业要相信传统学位证书以外的东西，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注册凤凰城大学 (University of Phoenix)，这里绝大多数人也都是远程上课的。凤凰城大学的发言人赖安·劳荣 (Ryan Rauzon) 说：“他们需要一个学位，而这并不会很快改变。”

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 vs. 传统大学课堂

为了比较我在网上学习和在传统教室听课，我顺道去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听了堂物理课——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的正相反。乔治城大学去年秋天只招收了 17% 的申请人，每年学费高达 42360 美元 (接近 26.5 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每堂课 4200 美元 (约合 2.6 万元人民币)。

学校的大型讲座课程物理导论能够容纳 150 到 200 名学生，得到的是相对传统的课堂体验——也就是说，没有按照大脑的学习规律来设计的课程。讲课的教授才接手这门课，拒绝了我听课的请求。

不过，乔治城大学倒是让我观摩了“物理 151”这门课，是科学专业的入门课程。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门课给人留下了很强烈的非传统的印象。每周上 3 次，但讲课的女教授隔 15 分钟就会停下来问一个问题，34 个学生则停下来思考、讨论，然后举起遥控器回答，让她了解他们学到什么程度。每周还有一次实验课——这是 Udacity 的网络课程所缺少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们每周会跟一名助教见面，助教会给他们布置设计好了来难住他们的习题，还会让他们分成小组吃透概念。

这门课的感觉像是一辆豪车：制作精良且昂贵。相得益彰的是，它身处一座崭新的现代化科学中心，造价 1000 万美元，包含 12 个教学实验室、6 间学生休息室和一个咖啡厅。这就好像是去一个科学温泉疗养中心（SPA）。

像乔治城大学这样的精英大学在近期内不大可能消失，就连 Udacity 的共同创始人（也是斯坦福校友）大卫·斯塔文斯（David Stavens）也这样承认。他说：“我想最前面的 50 所学校应该会是安全的。在大学校园里有这么种魔法，只要你能在那泡泡里面住得起，就是美好的。”

那这又将置全美国剩下的 4400 所颁授学位的院校于何地呢？说到底，只有 1/5 的大一新生会在学校里住校。将近一半的人上的都是社区

大学。很多人从未住过宿舍，更别说科学 SPA 了。为了回到实际，我走访了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大学（University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UDC）——这是众多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大学排行榜上的学校之一。

到达 UDC 的生命科学大楼时，我见到了达里奥·卡特里（Daryao Khatri）教授，他已经教了 37 年书，可看起来仍旧由衷地为新学期第一天上课感到激动。

“他们讨厌物理，”他这样说他的学生们，笑着：“你看着吧。他们怕着呢。”他把我带到他的教室，一个装着日光灯铺暗黄色油毡地板的实验室。他的 20 个学生大多是白天有工作的年轻人，这也是他们在晚上来学校的原因。很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进医学院，而他们需要学物理才能去那里。

卡特里一开始让学生们做自我介绍。一位生物专业的女士说：“我高中时学过物理，它是我学过最难的课。”

卡特里大喊道：“我会改变它的！”另一位年轻女士说：“我在网上学过微积分，实在是太惨了。”感觉上这比大学课更像是个互助小组。接下来卡特里详尽的介绍了课堂守则。他友好语气说：“请关上手机。不是改成震动。我会把它收走。手机对科学课程来说是一大灾难。”

卡特里的学生人数连布朗教授在 Udacity 的 1% 的一半都还不到，但他却在物理之外许多技能上给予他们帮助。他培养纪律和专注，重建信心并培育信心。“如果你没有学会一定要说出来。”他不止一次这样说。

在整整一小时的各种介绍和期望之后，卡特里开始回顾几何和三角函数，这样学生们才有基本的数学基础。他的讲解比 Udacity 的布朗要详尽得多，而且从学生们的问题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需要这一帮助。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的数学和科学基础满是破绽，许多重要的地方都是漏洞。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卡特里叫每一个学生都起来回答问题和解答题目；这跟 Udacity 的课一样，学生们不能长时间集中。

三周以后，我又回去了上卡特里的课。他落后 Udacity 的进度差不多一周，而且提的问也更简单。但是，没有一个学生从他的课上退出。当我问一群学生他们是否愿意在网上学这门课的时候，他们一齐说：“不会。”

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 MOOC 对那些积极主动且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基础的学生来说还好。但在世界范围内，最穷的学生们还没有那个基础（或是互联网宽带）以一种主要的方式参与进来。特隆和他的 MOOC 竞争者们也许是朝着教育民主化这个目标进发，但这并不会明天就发生。

那么，明天会发生什么呢？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那些尖子里面挑尖子的大学，以及来者不拒的大学将会继续优势发展。从它们最好的一面看（而且他们也只让我看到了它们最好的一面，这一点有必要指出）乔治城大学和 UDC 的意义在于它们各自起到了一种在网上不能轻易复制

的功用。而处在中间的大学，尤其是那些收费贵但并不是特别有名的营利性学校，将会需要更加努力让自己的收费变得合理。

最理想的情况是，Udacity 及其他 MOOC 提供者将褪去高等教育的所有一切浮华外衣——牌子、价格还有设施——让我们所有人记起教育的本质是学习。除了从下面拉低学生成本，MOOC 要是能从上面对教学质量施以压力也会很好。

从 9 月 27 日起一直到 10 月中旬，巴基斯坦的 YouTube 一直是黑的，而且在尼亚齐拉合尔的家里，每隔 4 小时电源就会闪断一次。但她还是在同班同学的帮助下把计算机科学 101 学到了一半。

尼亚齐爱 MOOC 超过她自己的学校，她想从早到晚都听安迪·布朗的课。但当我问她如果 Udacity 大学存在的话，她愿不愿意从那里取得证书的时候，她沉默了。她之前就有一个梦想，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梦。她说：“我还是会上哈佛或者斯坦福。我很想真的见见我的老师们，和全班一起学习并且成为朋友——而不是只在精神上在那里。”

来源：《时代周刊》 作者：Amanda Ripley

在线教育：卡位正当时

在不久之前的新东方 20 周年庆祝大会上，俞敏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家中国最大培训机构的创始人称“百度、阿里、腾讯全部上了教育平台，三家公司创始人都是我的朋友，却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我的领域”。而新东方本身也开始要思考“新东方培训教育到底是面授教育还是线上教育？”毫无疑问，在线教育的趋势来了。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线上教育的概念就诞生了，当时主要作为高校的一种教学尝试。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在线教育一直不温不火，直到近几年却突然变成了一个热门词汇。

资本市场的垂青或许可以看成是一个风向标。据相关数据显示，仅 2013 年，有关线上教育的投资便有 28 起之多，其中备受关注的有沪江网获得 2000 万美元的 B 轮投资以及前世纪佳缘 CEO 龚海燕创办的 91 外教网获得 400 万美元的 A 轮投资。

很多人之所以看好在线教育，是因为这块市场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而且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什么公司在这一领域独领风骚。

但是和传统教育不同，在线教育有其独特的基因，这种模式的利弊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互联网的发展总是喜欢强调“快”，这似乎和教育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在谈网络教育时，应该以教育为主，网络只能看成是一个工具，如果违背了这个初衷，那么企图用互联网颠覆传统教育是不可能的。

学历教育，有壁垒的刚需

盈开投资合伙人蔡华博士告诉《天下网商》记者，从教学目的来看，在线教育主要可以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学历教育按年龄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0~6岁学前教育阶段、K12阶段(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 即幼儿园至高中阶段)以及大学教育阶段。

智能终端的普及为在线教育提供了施展的平台，尤其是伴随 iPad 的出现，大量教育类软件喷涌而出。比如今年 1 月份获得 A 轮投资的宝宝巴士，已经研发了 70 多款适合学龄前儿童的启蒙教育软件，年轻父母对于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非常有好感。

如果说学前教育没有什么升学压力，父母都非常乐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这个阶段的话，那么 K12 阶段的教育问题就显得比较沉重了。

蔡华认为 K12 阶段是在线教育中想象空间最大，同时也是最看重模式的一个阶段，K12 阶段的孩子肩负沉重的学习压力，课堂教育基本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时间，所剩不多的时间也在忙于各种线下的培训班，所以很少能看到针对 K12 阶段的在线教育项目。

“也有例外，比如向上网就成功对接了学校教学的需求。”蔡华告诉《天下网商》记者，这类公司的切入点非常精准，它们就好像是学校的 ERP 软件，通过互联网实现师生之间的无缝对接。老师可以通过向上网布置作业，学生可以直接在网上做作业，甚至之前无法上交给老师的一些口头作业也能通过录音的方式即时上传给老师，老师可以打分后在课堂上直接播放。

而在线互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网络上的数据是可积累的，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实现个性化的辅导，即时查漏补缺。

“作为一种增值服务，它通常是收费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说，没有什么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了，况且一年花几百元接受这样的服务比请家教、上辅导班便宜多了。”据蔡华介绍，向上网成立三年来，已经与浙江地区 100 多家学校达成了合作，虽然目前尚未开通付费项目，与学校的合作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盈利前景非常看好，而且这种模式的复制非常方便。

但是这种与学校教学大纲紧密结合的模式具有一定壁垒，所以更多针对 K12 的在线教育模式以在线家教为主。“好的师资力量往往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通过互联网可以打破地域壁垒，让三四线城市的学生共享到优秀师资。”但是蔡华同时也指出，教育是地域性很强的产业，北京的名师未必就能教好杭州的学生，所以这种模式从目前看来并不怎么接地气。

而且 K12 教育的接受者和买单者是分离的，如果产品充满趣味性讨好了孩子，但家长却未必愿意买单。除了家长这关，K12 阶段的教育监管部门林立，试错成本巨大。所以对于教学机构来说，如何设计教学内容其实是一个平衡多方需求的问题。

而说到大学教育，虽说中国的高考录取率年年攀升，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无法进入高校深造。文凭作为步入社会的敲门砖，形成了一块刚需市场。于 2007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弘成教育便是国内最早从事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服务的机构。在这种模式中，学校一般会有专门的成教育学院，或自己招生，或委托第三方。

“通过远程教育拿到的文凭，市场确实有这个需求。”蔡华认为这种模式很难突破自身的天花板，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和过窄的上升通道让这块市场得以生存，但是想要进一步，就需要这些教育机构提供更具有竞争力的教学设计，以提升教学效果以及文凭的含金量。

非学历教育的刚需机会点

如果说学历教育的蛋糕，民营机构想分得一块比较困难，那么能够市场化运营的就只有非学历教育了。

非学历教育大致可以分为语言类、考证类、公务员考试、技能等。

近十年来，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持续高涨，更有大量学生留学海外，以新东方为代表的语言培训类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在线英语做得比较成功的是沪江网，除了提供充满趣味性的教学内容以外，沪江网还积极与众多线下培训机构合作，帮助它们通过网络渠

道招生。而再创业的龚海燕的 91 外教网则是采取全外教的形式，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音视频实时互动教学。

除了英语这个大热门，公务员、考证类也是在线教育比较热门的类目。这些类目相比其他更容易实现网络教学，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华会计网校，考过会计证的学生基本都会用到它。这类专注于细分市场的教学机构，定位精准，迎合了一部分刚需。

其实技能类在线教育市场也值得关注，蔡华介绍说，无论是大公司对新进职工的岗前培训，还是求职人员通过网络自学，目前看来都存在市场空白，能承接这些需求的第三方公司数量尚未饱和。“即使是在职人员，也有定期充电的需求。”但是大多数教学机构并没有做到个性化施教，现状下，员工处于“有欲望无动力”的情况。

在线教育平台

人们对于线下教育的付费意愿非常强，语言类的培训班动辄几千的培训费，学习者依然络绎不绝。反观线上，消费者似乎尚未养成付费习惯，盗版课程也比较泛滥。

之所以认为网络教育的平台化操作模式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是因为它具备了流量以及更多的选择性。优秀的师资是一种稀缺资源，以考公务员为例，传统的做法通常是一个机构聘请资深教师，在全国各地租场地授课，一堂课可以挤进近千人，教学效果自然谈不上多好。但是一旦在线的万人公开课技术成熟，一方面机构节省了高昂的成本，另一方面对所有人来说也节约了时间成本。

“在线教育最关键的两点是流量和教学设计。如果营销以及引流的成本过高，在线教育就失去了其意义，而优质的在线教育内容可以留存客户。”蔡华认为淘宝同学在这个点进入在线教育领域是比较合适的：

首先是电子商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培育了大量有在线支付习惯的消费群体；

其次是在在线教育的技术臻于成熟；

最后是大量传统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在网络教育端发力。

平台化的另一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原本没有能力实施在线教育的教学机构搭建平台，最大程度降低了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很多小型的培训机构，它们非常接地气，对一块区域内的某个细分市场非常了解，但是它们的覆盖面很小，而一旦和淘宝同学平台打通，它们完全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让更多流量与优质的在线服务对接。”

蔡华认为实现在在线教育在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传统线下教育机构也摸索出一些网络教学的规律，比如以前的网络录播视频通常沿袭线下的做法，一堂课长达四五十分钟，这会让大多数学生产生视觉疲劳。现在大家基本都达成了共识，每堂课在8~20分钟之间，这更符合在线教育的特点。

往往懂教育的人不懂互联网，懂互联网的人不知道如何把网络优势运用到教育上。在线教育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手段，无论是利用视频还是其他方式，目的都是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所以好的在线教育体系肯定

是真正从学生角度出发的。经过这几年的培育，蔡华相信即将迎来在线教育的爆发期。

(本文原载于《天下网商》十一月刊)

■ 北大新语

北大新语·风骨

○戊戌政变以后，除京师大学堂外，新政悉被废除。当时天津《国闻报》报道说：“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后来，梁启超也说，戊戌变法成绩，“可留为纪念者，独一大学堂而已。”

○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任职后，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曾谈到京师大学堂的重要地位：“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材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由张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制纲领。”

○管学大臣张百熙曾为京师大学堂题联：“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

○1912年，梁启超在北大发表演说，指出北大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成为全国最高学府，是因为北大不仅具有普通学校的功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其在社会上生存发展的能力），而且还具有特别之目的，即“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他还说：“大学校¹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

¹ 编者注：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一度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所以时人多以‘大学校’指称北京大学。

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

○胡仁源任北大校长期间（1914年1月—1916年12月），在一份关于北大发展的计划书中说，北京大学设立的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

○1922年10月5日，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蔡元培说：“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此后，蔡还说：“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开办迄今，……四方来学者，日益以众。……夫以济济多士，萃集一堂，研究学术，砥砺德业，本互助之精神，作他山之攻错，彼此情宜，实有联结之必要。”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正如冯友兰所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放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提倡“自由听讲”的学风。人称当时的北大有“五公开”或“六公开”：课堂公开，教室可以随便进去听课，讲

义开始可以自由领取，后来交钱也可以买到；图书馆、阅览室公开；运动场公开；学生食堂公开；澡堂公开；学生宿舍管理松散，实际上是半公开。一时之间，北大课堂上多了许多没有学籍的旁听生。他们不受歧视，一样坐在北大教室听课。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沈从文以及曹靖华等人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有一次，沈从文还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参加考试，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曹靖华后来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长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倡平民教育，先后创办北大校役夜校和平民夜校，为北大全校工友和沙滩附近的平民子弟提供教育机会。1920年1月18日，在平民夜校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演讲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蒋梦麟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

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他还说：“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抄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1923年，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曾将北大的精神概括为两点：“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解释“大度包容”说：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辨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解释“思想自由”说：“本校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学子因明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从1917年11月16日起，经蔡元培倡议，北大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京报》主笔邵飘萍向北大学生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经过情形，并勉励北大学生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灭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有人还持刀要自杀以此激励国人，会场“现出一种如火如荼，不屈不挠之气象。”后遂有五四运动之举。

○1919年5月4日，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游行总指挥是北大学生傅斯年。下午1时，云集天安门的各校学生通过了北大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在游行过程中，沿途散发了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万多份，《通告》中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

○五四运动中，北大部分学生被捕入狱，许德珩也在其中。其他学生知道后，集体到公安局自首，表示愿意集体坐牢。后来，许向北大学

生讲述此事时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1920年，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盛赞五四运动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撻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民国时期，北大素以闹学潮闻名中外。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大学生赵九成撰写了一篇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称北大的学生运动，不是从一二九开始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开始的。“追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说北大的发展有两条大路：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

○20世纪30年代编纂的《北京大学概况》曾将北京大学“校风之特点”概括为五点：(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

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大新语》 编者：严敏杰 杨虎

北大新语·论学

○孙家鼐说：“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

○严复说，要使中华文化有新发展，就必须“阔视远步，统新故而视其通，包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

○蔡元培有治学四决：宏、约、深、美。“宏”指知识结构要博大宏伟，兼收并蓄，了解临近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贯通，以打下坚实基础；“约”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时间宝贵。当基础打好以后，就当由博趋约，从十八般兵器中选择一两件最合手的，否则精力分散，顾此失彼，势必一事无成；“深”是指精通、发展、创造。在约的前提下重点突破、究本穷源，自然会发现新的境地；“美”是治学的理想境界。唯有付出巨大的劳动，才有可能进入这种境界。

○黄侃旧学功底在时人中堪称一流，治学向以严谨著称，决不轻易著书立说。曾立誓“五十岁以前不着书”。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治学严谨，刻苦研求，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并称：“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

○熊十力说：“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他在《读经示要》中写有两句话：“作人不易，为学实难”。

○熊十力被认为 20 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在学术思想的创发性上，特别强调“自得”，“体悟”，“我就是我”，决不依傍门户，对各家各派均有所取，亦有所破。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肤浅知识及腐烂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

○熊十力主张：“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他还解释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对于中国学人缺乏“孤往精神”感到十分遗憾：“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于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超北海之类，殆又难之又难。”

○1949年12月，熊十力的《十力语要初续》在香港出版。《初续》中云：“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蒋梦麟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说，将来“有三件重要的事，很应当注意的”：第一，对于西洋的文化，“用全力去注意它”；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整理国学；“第三件要务就是注重自然科学。这是为文化运动扎根的工作。无论是文科的，法科的，理科的，都应着实的注意自然科学。”

○蒋梦麟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息；精神息，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

○蒋梦麟说：“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两者须相辅相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在胡适眼中，理想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

○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胡适晚年对人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

○胡适说他很少有紧张、忧虑的时候，“不过遇到烦心的事情，就坐下来做些小考证。做些小考证，等于人家去打牌，什么都忘了，可以解除烦恼。”

○1919年8月16日，胡适就“整理国故”的问题答毛子水说：“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

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

○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存疑是顾颉刚治学的一大特点，他说“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

○顾颉刚认为：“一个学者决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的面色的，看人们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

○顾颉刚回忆他青年时代对学术的认识时说：“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该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这一认识上的觉悟被顾称为“生命中最可纪念的”，因为它是“学问上有所建树”的“根源”。晚年作《颉刚自传》时，顾颉刚先生又说：“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

○顾颉刚说：“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学者的本份就像农夫和土工一样，须“一粒一粒地播种，一

箕一箕地畚土。”又说：“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徼幸取巧之心。”他还说：“我以为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决不能轻易便捷像民意测验及学生的考试答案一样。”

○顾颉刚说：“学者本是作苦工的人而不是享受的人，只要有问题发生，便是学者工作的区域；这种工作虽可自由取舍，但不应用功利的眼光去定问题的取舍，更不应因其困难复杂而贪懒不干。”又说：“我们处于今日，只有作苦工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利。”反之，须人人抱“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之心，而后乃有真学术可言。

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大新语》 编者：严敏杰 杨虎